

组织演变与文教革新

——晚清与五四之间的江苏省教育会

徐佳贵

【摘要】近代文教组织研究,须充分注意组织行为既处于文教趋势之中,也可作用于趋势本身。晚清与五四之间江苏省教育会的权力更迭,意味着以“教育”为自身主要业界标签的“中等人”崛起。与之相应,会中知识人对本会旨趣的理解,从凸显政治目标及政学关系,渐转向教育本身相关学理的研究与更新。进而通过一系列关乎知识信息摄取与社会网络重构的组织建设,此期江苏省教育会进一步突破区域组织的定位限制,参与带动全国思想文教之革新。但在另一面,该会的组织活动仍未与牵涉政学关系的传统完全决裂。考察此期江苏省教育会自身及所带动的变革,可为组织机构史视角下近代文教如何从晚清向五四“过渡”的问题,补充一则在“北大中心”叙述以外的重要案例。

【关键词】江苏省教育会;五四前夕;组织建设;世界新潮;黄炎培

【作者简介】徐佳贵,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235)。

【原文出处】《史林》(沪),2021.3.131~146

江苏省教育会(1905-1927)^①是一个近年日渐引起学界重视的组织,其名义上仅为一省级组织,却长期拥有全国性的权势与影响力。论者对该会的沿革有过梳理,并述及其与清末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1925年东南大学易长等重要史事的联系。^②但在“晚清”与“五四”两个重要时间点之间,对该会的考察目前仍显薄弱。^③广而言之,民国代清之际至五四运动之间的文教组织团体研究,相对民国史的其他时段亦显薄弱;^④在聚焦这一“过渡”时段的研究中,围绕北京学界尤其是北京大学的研究堪称一枝独秀,这一定程度上是回溯“五四”之因的思路所致。然而今人也已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缘起”,并非北大一家所致,而是涉及中华革命党一国民党及江苏省教育会等多方势力;^⑤据此上溯,文教组织史中的五四“前史”,也不能仅仅关乎北大或依托北大的知识社群。另外,今人的研究(尤其是五四运动相关研究)多倾向于将江苏省教育会视作一个拥有统一意志或利

益的团体(同时默认这类意志或利益具有长期的稳定性),而低估了其内部竞争又协调,及其组织架构与权力行使发生变化的一面。辛亥前后至五四前夕,即是变化的一个关键期,此种变化直接关系到同期区域以至全国性的文教趋势,值得专文探讨。

再论近代“教育会”组织的研究现状。学会、教育会等组织的蔚起,无疑是清末民初“转型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⑥对此,今人研究常见一种结合教育与社会变迁的思路,一面凸显一条“教育近(现)代化”的主线,一面又借此析论近代“官—绅/民”或“国家—地方/社会”之类关系的演变。但在实际操作中,除却展示多半基于后设标准的文教“近代化”指标,相关的问题意识与结论,与对议会、商会等组织的研究时常难以区分。其间未予深入的一个问题是,研究者应如何把握教育会组织显露的“业界”意识,不至与其他界别(如政、商界)组织过分混同,也不至于有意无意地套用今日的专门或职业界别观念而

过分求异?一种应对之法,不是强行对该组织作整体、静态的定性,而是将该问题充分“历史化”,即回归现场,爬梳此种同与异发生、演变的动态过程。有论者谓在清末科举废除之前,“教师一直是官僚体系的附属物,是科举制度的副产品”;^⑦参照这一表述,本文也将涉及从组织史的角度(而不完全是思想言说的角度),析论晚清与五四之间“教育”如何进一步自成界别、由“副”转“正”,而当局者又未与观念及实践层面的相关“传统”完全决裂。

一、“教”以为“政”

今人在考察江苏省教育会时,通常凸显会中声望甲于东南的名流,尤其是作为主要发起人并屡任会长的张謇等人的角色。^⑧不过,这些名流往往拥有多地多种组织的头衔,江苏省教育会的职衔在其中是否算得上重要甚或主要,尚须细辨,不能默认其言行可以直接“代表”教育会的组织行为逻辑。^⑨在组织研究中,“组织边界”的确定向来是一个难点;^⑩在此,应回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在考察某一文教组织时,应具体关涉哪些人的哪些言行?回到江苏省教育会,“组织”研究亦不可简化为个别名人之“关系网”的研究,确定人与组织的关系,首先便应梳理该

组织自晚清以来的架构与权责分配情形。

江苏省教育会的组织架构,较其他省教育会一向更形完备,但其在清末的架构与民国阶段有所不同。在晚清,除一般会员外,会中职员有正副会长、干事员、评议员、会董等类。论者多已指出,苏省长期存在多方面的“宁属”“苏属”之别,为使江苏的省级非官方教育组织能真正统合两属,教育总会设于南京、苏州以外的上海,正会长定由宁、苏轮流,经全体会员公举,两位副会长定宁、苏各一,由宁、苏属籍会员分别公举。而各类职务身份,亦有不同的集会之期:会员参加的常年大会一年一次;全体职员会在常年大会后举行一次(或因事招集);评议员会每年于常会前后各举行一次,此外每月举行一次;会董会每年举行一或两次(或因事招集)。干事员集会最勤,为每周一次。^⑪由此可以“养成士绅会议之惯习”^⑫及面向组织的身份认同,以形成或保障该组织的凝聚力。而显然,各类职务应以为“惯习”的集会频度是不一样的,在诸职员中,干事员对会务的参与频度最高,其中的驻会干事,理应与会务关系最密。鉴于驻会干事的重要性,兹将江苏省教育会历届驻会干事与正、副会长的名录与当选年份一并列出:

表1 江苏教育会历届驻会干事与正、副会长的名录与当选年份

职务	姓名	当选年份
正会长	张謇	1905-1908;1912-1921
	唐文治	1909-1911
	袁希涛	1922-1926
副会长	王同愈、恽祖祁	1905
	王同愈、邓邦述	1906
	王同愈、魏家骅	1907
	王同愈、许鼎霖	1908
	张謇、蒋炳章	1909-1911
	王同愈	1912-1913
	黄炎培	1914-1926
驻会干事	沈同芳	1905-1907
	沈恩孚	1908-1911
	姚文枬	1912
	蒋炳章	1913-1915
	沈恩孚	1916-1926

资料来源:《江苏省教育会年鉴》,上海江苏省教育会1916-1926年版;《江苏省教育会昨开常年大会记》,《申报》1926年8月23日,第10版。按今人多引民国《上海县志》中的江苏省教育会正副会长名单,但该名单有不少错误,见民国《上海县志》(1935)卷7“教育”,《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16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第2册,第542—543页。以上所列包括1905-1906年的江苏学务总会时期,其时的“总理”相当于后来的“会长”,“协理”相当于后来的“副会长”。

可见在实际执行中,晚清江苏教育总会确乎遵循了正会长由宁、苏轮流,副会长则一宁一苏的配置。教育总会通常要借重这些身为苏籍名流的正副会长在省内外声望及人脉,而名流巨绅对于会务的实际参与度,则因人因时而异。据目前所见材料,晚清张謇、王同愈、蒋炳章以教育总会名义行事的情形似相对较多;但他们与其他曾任正副会长者一样,往往具有官场、咨议局或实业团体等处的多个职衔,很难说必以文教为其首要的界别标签。

正副会长本人主要的业界标签暧昧不明,在江苏省教育会初创时似乎并非一个问题。政、商、学多栖的士绅名流组建或置身于多个业界组织,当时显然是普遍现象,而这些所谓的“业界”组织与其他界别在人事乃至宗旨方针上,也常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乙巳年(1905)九月江苏省级教育会肇建之时,称“江苏学会”,旋改“江苏学务总会”。^⑬而发起同人对于该会的期许,或近于梁启超戊戌维新时期已表达的“士群曰学会”之意,^⑭即是“士”的一种集结。而一省之“士”集结成以“学”为名的“群”,将欲何为?对此,最初的驻会干事沈同芳总结说:“当今朝廷锐意更新,将有事于地方自治。夫发轫自治之原理者,非学会之责而谁?故记者以为学会者,地方自治之雏形,江苏学会者,尤为全国社会之雏形也。”^⑮处所谓的“地方自治”不限于文教议题,其宗旨诚然有别于早先中国教育会、军国民教育会等组织中某些成员的激进倾向,但也体现了某种立足于地方而相对于“官治”的、政治性的企图心。1906年,教育总会首先附设的研究会即是“法政研究会”,之后改“法政讲习所”,均推早稻田大学法政毕业生雷奋主事,^⑯其目的即为“试行地方自治,以立议会之模范”。^⑰再结合前引梁启超之言的上文谓“国群曰议院”,此处“士群”以本地“议会”为目标,凸显的依然是“士(群)”与“国(群)”、或地域与国家在政治上的紧密关联。

可以说,作为“士群”的“学会”,开初富于“同人团体”意味,即有共通的偏于政治的意图作为“合群”之保障。但同在1906年,省县教育会又成为清廷明令各地务必成立的一类组织。清廷虽仍认教育为地方自治事业的一部分,但法定的教育会宗旨仅在“补助教育行政,图教育之普及”,并与作为提学使办事

与顾问机构的省学务公所以及半官方性质的各地劝学所“联络一气”。^⑱江苏学务总会奉令更名“江苏教育总会”,自此具有了“同人团体”与“法定组织”的双重属性。“法定组织”属性可以提供必要的制度环境保障,方便组织的生存与规模拓展;但若要保证组织有目标、行动有效率,“同人团体”的属性亦须维系。^⑲问题是,若“同人团体”的目标与“法定组织”的要求难以一致,又当如何应对?在初期,教育总会面对的情况是:一方面,其指向设立“议会”的行动策略仍得继续,以育成“法政”人才为重点目标,乃至稍后出现了江苏教育总会、预备立宪公会与江苏省咨议局在人员上近乎“三位一体”的局面。^⑳但另一方面,“法定组织”的定性也对教育总会的行动造成限制,除却会董制之类的设计尚可借以直接影响地方劝学所,^㉑更名后的江苏教育总会整体在政学关系上已难公然无视官方划定的职权域限。

1908年,沈同芳辞职赴粤,作为长期驻会者与文牍编辑,他应是最有资格总结该会成立三年以来“事功”的人。然而,其所撰总会三年内之事略,在日常文牍事务以外,仅只提及法政研究会与讲习所一项。事实上,沈数年来的议论焦点,均是如何向官方争权益、争资源,将教育总会认作“社会”之代表,进而聚焦于本组织与省内外政治势力及动向的联系。^㉒复因自己曾参与倡设法政研究会,沈同芳对该会的成效亦颇自得,称:“此不敢即谓政治教育,但吾苏各属,即现在筹办咨议局一事,除教育会会员及法政听讲员,肯出任事者有几?任事矣,稍具普通知识不至为无意识之冲突,除上项人员外,又有几?”^㉓显然以为该研究会与讲习所对于一省近于“议会”性质的机构——江苏咨议局的人才养成居功至伟,也应成为他本人驻会期间的一大实绩。

除此而外,沈便似乎再无多少“事功”可列。于是下文转为沈的长篇自辩。面对总会未能促成“教育普及”的质问,沈抬出制度规章,回应本会仅能“辅助行政机关”,且当前会中常费仅有省学务公所的十分之一二,却已用度不菲,自己与同人业已尽力,某些人的批评显系“无谓之议论”。而总会“照章不涉教育以外之事”,其他“公共之事”仅是曾利用总会场所,而与总会本身无大干系。^㉔可见沈同芳的逻辑,

是一方面以“同人团体”富于政治意图的初期目标不日实现为三年内之成就,一方面又以“法定组织”的法定限制为成就的有限性辩护,而教育总会的主要功绩,在沈看来也只能在官绅各方围绕政学关系的互动博弈中取得。

1909年,江苏省咨议局正式成立。虽然清廷并不以此为西式“议会”,但江苏士绅则倾向于认为省咨议局即省议会,^②这意味着作为“同人团体”的教育总会初定的建立地域性“议会”的目标基本达成。问题是,目标既达,凝聚同人的力量便可能丧失,新任驻会干事沈恩孚便曾直白地表达此种担忧,强调“教育事业不发达,则宪政之基础仍不固”,呼吁总会中人切勿以为此后可“憩而息焉”。^③江苏教育总会若仍欲保持“同人团体”这一初始属性,便应为组织培养新的旨趣目标。

二、“中等人”崛起

较沈恩孚年轻14岁、受其推荐继任文牍编辑的黄炎培给出了不同于前任编辑的思路。在同年的文牍汇编中,黄炎培多少基于自身参与地方纠纷调解的经历,公开表达对以往会务的不满(可能就是沈同芳文称发“无谓之议论”的人之一),称会中文牍仅是“牒诉控愬”,会议记录仅是“纠理纷难”,即专注于协调关系、分配资源,而“此之所为于教育曾无当毫末”。现今“东西列邦文人硕士”研求“学理”,中国教育行政中人对此却不予重视,教育总会应代为担起这一“研究”的重任。^④

这一思路本为部章所准许,曾任教育总会评议员的陆尔奎同年亦曾撰文,提及中国的教育会兼有“地方会”与“目的会”之性质,前者基于法定,重在“辅助教育行政”,后者则系自由集结,主旨当在研求学理,但学理具体如何研求,则语焉不详。^⑤黄炎培关于学理研究如何开展的表述则要明晰得多,而这也应是受了新近同人出洋考察的刺激。1909年二月,上海龙门师范教员兼附小办事员杨保恒、浦东中学校教员兼附小主任教员俞旨一、通州师范学校毕业生周维城由江苏省教育总会差派赴日考察教育。^⑥杨为黄炎培同乡,俞早先为南洋公学学生,与同样曾在南洋公学就读的黄氏又共事于浦东中学,二人均与黄关系密切。回国后,日本教育的“锐进”、学理的

不断刷新,反衬出中国教育界虽亦吸收外方学理,但对于学理“更新”反应迟钝,黄炎培深受刺激,明文提出总会今后的新目标:于国外,当“岁遣人走东西国,博览而周咨之,录报于会”;于国内,则当“岁遣人往来江南北郡县,指示而策划之,推陈而入新,征长以裨益”,即“研究”重在“更新”,将海外先进学理尽快沿国、省、省属地方逐级输入,而以教育总会“总司其机”,以“尽新陈代谢之效用”。此次三人回国所作报告,登于该年的文牍汇编中,黄炎培在汇编跋语中特地提示读者“无庸致惊于三君之报告跃然作异彩,谓胜于倥偬之牒诉,相与姝姝以自悦也”。^⑦考察的直接成果,即是会中设立“单级教授练习所”,该练习所显然与之前的法政讲习所不同,并非聚焦于政治问题,而是谋求教育方法本身的改良推进。^⑧

应予指出,对黄炎培初期在教育总会的地位,不宜作过高估计。就文化资本而言,黄仅于1902年得中举人,而江苏为清代科举中进士者最多的省份(且苏南最为集中),举人功名在省级事务中显然不会为之提供多少地位优势。另按新学标准,黄也仅是早年在南洋公学就读约一年,后因故避至日本,仅至清华学校学过日文,未曾正式留学。^⑨驻会干事沈恩孚虽年龄不小,也仅是举人,此外也只是在清末曾赴日考察。^⑩可见黄、沈在新旧两面的文化养成与资本,均是不高不低,加上难言烜赫的家族背景,大致只可算作“中等”知识人。但在清末,正是这些“中等人”与地方学务(主要是中初等教育)关系更为直接,对教学问题的感知更为具体,其在新式教育系统中的关系网络,也相对更显细密。因此他们虽仍不能避免跨界兼职,但从中择取自身“主要”业界标签的意识,较之身为进士翰林、达官巨商的总会领袖便可能要更为强烈。^⑪

且如前所述,干事(包括驻会干事)是江苏教育总会集会最频繁的一类职员,这就对职员到会的便捷度提出较高要求。长期活跃于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且无多少官差牵累的“中等人”便有了近水楼台的优势,江苏省教育会截至五四前夕的干事累任情况便体现了这一点。经统计,晚清至五四当年常年大会前江苏省教育会历任干事次数最多的11人,除许鼎霖一人来自旧宁属的苏北,其他均来自旧苏属的苏

南地区。其中龚杰、吴馨、方还、许鼎霖的任期靠前，未做到1914年。而如原籍非上海或松江府的包公毅、庄俞，初任江苏省教育会干事时也已供职于上海的《时报》馆、商务印书馆等机构。^⑤黄炎培则是在连任8年干事之后，至1927年一直担任副会长；同样久驻上海的沈恩孚，更是自1906—1927年均担任会中干事。大略而言，黄、沈的主要经历关涉上海及其周边的两个新式学校系统：黄炎培在清末深度介入川沙与浦东地区的中小学校务，此外则有依托早年在南洋公学的经历发展出的学界网络，如蔡元培（在南洋特班）即与之有师生之谊。沈恩孚则早年肄业上海龙门书院，之后又与同院肄业的袁希涛及贾丰臻等承担由书院所改的龙门师范（及其后身江苏省立第二师范）校务。这两个系统人士对上海及其周边学务的介入，便为其“就近”行使或扩展在江苏省教育会中的权力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不过，江苏省教育会系一省级组织，除却利用地缘便利，在上海总部扩展权力，尚须顾及总部与省内其他地区的联结。黄炎培长期担任“调查部”干事，这便又为他实现此种坐镇沪滨、通达四方的联结提供了职务上的便利。1910年常年大会议设“常任调查员”，定由黄氏“专任其事”，“从通州、苏州而始，次年复历江北各处”，^⑥据黄氏后来自承，“江苏六十三县”，他“足迹及四分之三”，^⑦借此与省内各地教育界发展出了稳固的联系。辛亥革命爆发，黄炎培参与东南光复，之后一度进入官场，担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而民初江苏教育总会已更名“江苏省教育会”，因宁、苏分治的格局不复存在，副会长之设也不再宁、苏各一。^⑧在1914年2月辞官后，黄氏即因居官期间及之前在江苏省县教育界积累的声望与人脉，在当年的江苏省教育会常年大会上被公举为副会长。^⑨两年后，辞去苏省民政司副司长之职的沈恩孚也再次担任驻会干事，一直到1927年江苏省教育会本身终结。

至于张謇，虽自民元至1921年均担任正会长，但他自1913年10月起先后担任北京工商、农商部总长，又兼全国水利局总裁之职，后又为参政院参政，在袁世凯称帝前后才辞去所有职务，脱离中央。辞官后，他的事业重心亦在家乡南通，对江苏省教育会

事务的参与度明显低于晚清阶段。1916年，张謇自称“曩常在沪，时贡所知”，但今已鲜有到会，故托黄、沈代向江苏省教育会辞会长职。^⑩此次辞职未成，至1921年，他又宣告辞去外界一切名誉职务，^⑪教育会正会长改由与黄、沈交好并同为旧苏属籍，且在民初屡任北京教育部次长的袁希涛担任。

统而言之，民国肇建，“全国人士趋附所谓政党”，^⑫尤其是声望甲于一省的绅耆名流倾心政界事务，这在客观上为教育界的“中等人”腾出了更多上升空间，江苏省教育会的黄、沈，及浙江省教育会的经亨颐等均可谓受益于这一形势。^⑬1914—1921年间代表江苏省教育会立言行事者，通常便是黄、沈诸人，^⑭江苏省教育会遂形成了正会长为组织提供声望、人脉与保护伞，副会长、驻会干事诸人掌握实权的局面。^⑮

进一步讲，在此过程中，组织方针的演变亦是与权力更迭互相促成、同时进行的。一方面是江苏省教育会作为“法定组织”，会众规模持续扩大；^⑯一方面是“同人团体”中“同人”的所指发生重心偏移，某些“中等人”圈子，尤其是黄炎培的浦东同乡、同事圈子（包括俞子夷、杨保恒、张志鹤等）与包括沈恩孚在内的上海龙门书院—省立第二师范圈子（包括袁希涛、袁希洛、吴馨、贾丰臻等）的地位，^⑰开始在“同人”之中凸显。早先创会“同人”自身的关系网固然不会遵从组织规模的扩张速率，但重心较一开始有所偏移的“同人”对于整个组织的“代表”机制，亦顺遂地得以维系。这一局面的形成，关系到黄炎培等人晚清时期业已表露的、着重学理更新的行动方针受到张謇、沈恩孚及其他会中人的支持或默许，渐变为组织本身的目标旨趣。

在任省教育司司长期间，黄炎培已向江苏省教育会提出组织“教育研究会”的意见书，甚至在民元中央公布的规程总则强调教育会应以“研究教育事项”为目的的基础上，^⑱更进一步声言“研究”教育乃“教育会唯一之责”。各研究会的常务由会中自行解决，唯“须建议于行政机关”之事，应由会长张謇以省教育会名义进行。^⑲辞官后，黄在国内也正式突破一省范围，开展“由近以及于远”的实地调查，1914年春夏之际“首安徽，次江西，次浙江”，9月后又北上山东

及京津地区。^⑤据黄的理解,如此从事教育,可以比作“治病”：“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内国考察,寻病源也”,纸面、实地双管齐下,海内、海外相辅相成,以强化病理与药理研究,实现“对症下药”。^⑥相应地,黄任副会长次月(1914年9月),江苏省教育会干事会即订定附设“研究会”通则五条,当月成立英文教授研究会,此后至1921年,又有小学教育研究会(1914年10月)、理科教授研究会(1914年11月,后更名理科研究会)、师范教育研究会(1915年1月)、体育研究会(1915年7月)、幼稚教育研究会(1916年5月)、职业教育研究会(1916年9月)、中学教育研究会(1918年8月)、县视学研究会(1918年8月,后更名地方教育行政研究会)、国语研究会(1920年1月,后更名推行国语委员会)、通俗教育研究会(1921年1月)等设立,^⑦黄、沈及俞子夷、杨保恒等人在上述研究会中甚为活跃。其中除县视学研究会直接关乎政学关系问题,其他研究会基本是聚焦于教育攸关的知识学理本身。而1914年,江苏省教育会亦开始在会所内专设图书馆,之后不断充实度藏,以利同人在会研究。

现今学者论及清末民初教育相关知识学理的引进,多注重上海及其周边“出版界”的活动,如新式教科书与教育类杂志的兴起等。但务必指出,联络各地“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教育会组织,也可为学理的引进、传播提供关键的渠道。教育实践中存在哪些具体问题,相应何种知识学理会更利于教学,教育一线工作者也拥有至少不小于久居书报出版机构之编撰者的发言权。民国元年(1912),经由江苏省议会议决,由省当局委托江苏省教育会筹建“图书审查会”,以杨保恒为审查长,审定图书作为全省暂行教材。此事显有省教育会向行政当局成功争得权力的意味,同时,图书审查工作也具有一定的教育“研究”性质。^⑧此后江苏省教育会又曾受苏省官厅所托,筹办体育传习所与童子军讲习会等。^⑨

江苏省教育会自身的出版事业在民初亦有进展。清末民初江苏省教育会领导层与上海的大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等关系一直较佳,与沪上大报如《申报》《时报》等关系亦好。不过,这些书报出版机构毕竟不受其直接控制,合作倡议也非有求必应。^⑩民元以后,江苏省教育会本身停止刊行文牍汇编,于

1913年5月推出《教育研究》月刊。此刊宗旨如其刊名,所谓“理以明辩而始得学,以互竞而乃精,一校之美恶,可推而之一邑一省而及全国,而兴焉革焉,其庶几渐臻于统一,而渐达于普及乎?”^⑪即重点依恃教育界自身的网络(而非完全倚赖大出版机构的平台),互通有无,以求共同研究学理。编辑主任王朝阳的“记者宣言”则称,既然行政机关对于学理研究力不能及,则“殚精竭力以追世界文化之新潮,非吾教育界之责而谁与归?”^⑫重申了研究学理、紧追世界文化“新潮”的思路与注重政学关系的思路二者间既相异又相承的关系。只是江苏省教育会自身的出版能力终究有限,《教育研究》自第26期(1915年12月30日)起改为季刊,后于1916年9月公决停办。此后改出《教育会月报》,以报告会中情形为主,“遇有研究之件或特别会务”,再增发《临时刊布》一种。^⑬

《教育研究》多登江苏省教育会同人文文章,曾着重宣传黄炎培等人力倡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该教育理念本身今人所论已详,本节仅是强调,江苏省教育会的学理研究通常并非讲求“精深”,个中关键在于理念的生成与及时传播。1913年,尚为江苏教育司长的黄炎培作《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书》,分送各地学校,“欲以发问的研究法”,引起教育界同人商榷。^⑭1913年起任江苏省教育会干事的商务印书馆编辑庄俞,认为实用主义“无深奥之义理惹人推阐,闻其语即解其意”,要点在于如何“实行”。^⑮黄炎培也深知这一点,之后他与同人力图将“实用主义”具体化到教学法层面,如加强实验、实习,提升学生的动手意识与能力等。1914年3月,会中出版黄炎培、杨保恒译自日人竹原久之助所著《小学校实用的施設》、“内容则大加损益”的《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作为《教育研究》的新年临时增刊。另或是在庄俞等人操作下,上海《教育杂志》也于同年推出了以“实用主义”为主题的增刊。

不过,或因“实用主义”本身名号寻常,内里似无“深奥之义”,研究的实际推进未如人意。1915年,黄炎培亲自赴美考察,此后他便开始将所倡之理念标签从较“抽象”的“实用教育”转向更为“具体”的“职业教育”。^⑯黄氏归国后,1915年12月,江苏省教育会干事会议决“职业介绍部”办法;^⑰1917年1—7月,

参照在日本与东南亚等地的考察所得,黄、沈等人又牵头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并办中华职业学校,不久又办《教育与职业》杂志。显然,中华职教社正是从江苏省教育会的一个附设研究会发展而来,在职教社成立后,江苏省教育会所附之职业教育研究会即告取消。^③

除却上海,南京教育界是江苏省教育会另外的一个经营重点。与清末宁、苏各设一分所不同,民初江苏省教育会在南京设一分事务所,依托该分所,江苏省教育会中人在宁积极开展教学研究、学术演讲等活动。而后南京一些国立学校的建设,也均与张謇、黄炎培、沈恩孚、贾丰臻等人直接相关,如1914-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建校,1917-1918年暨南学堂的复校等,这些国立学校除却策划、建立过程,此后在资源摄取及教研活动的开展上,也与江苏省教育会有稳定的合作。^④唯须说明,省教育会不可直接控制学校,黄、沈等人上述行为多是通过筹备会之类的名义;而后来在1920年代,他们通过重组“校董会”等方式,而非直接以江苏省教育会名义影响东南大学等校校务,也应与此限制有关。^⑤

综上所述,由清入民,在组织的法定地位及组织中人身观念、人际关系等多种要素的综合作用之下,江苏省教育会“同人团体”与“法定组织”的双重属性得以维持。与此相辅相成的是,会中领导层对于作为事业界别的“教育”二字的认识持续深化,对于身在此会此界应做什么、能做什么的问题,见解也渐趋明晰。教育不再被认为理应直接导向政治、不再仅为政治之附庸,而如民元该会章程总纲中“注意政治上之教育,以养成国会、省会、县会、市乡会之人才”之类的条款,^⑥在之后的重订版中也被删去。^⑦这一变化关系到人事变迁,教育领域本身应该、也能够供人深耕细作,正是某些未尝跻身政治高层、但长期操持地方学务的“中等”知识人的经验之谈,而其中也自然包藏了他们对于自身主要事业选择的“合理化”机制。

三、海内与海外

如前引黄炎培所述,江苏省教育会尚有意使自身成为沟通国内各区划层级,乃至沟通中外教育界

的一个枢纽性组织,以利学理之汲引流通。问题是黄、沈诸人在新旧两面的文化资本,大约只能促其跻身“省区精英”,^⑧民初在他们实际主持下的江苏省教育会,又如何维系乃至发展其不限于本省的权势与影响力?对此,该会的策略便是充分结合人脉的拓展与进一步的组织建设,将该会对自身“区域”性质的突破予以“常态化”。

策略之一,是与其他组织联合发起全国性的社团或会议,兹不展开。策略之二,则是江苏省教育会本身组织触角的延展。这种延展意味着依托东南巨埠、多少自居整个海内之“代表”,直接触及海外势力。除却与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欧美同学会、中国科学社等涉外团体保持联系,黄炎培就任副会长不久后,1914年10月9日,江苏省教育会自身即新设“交际部”。^⑨该部正是为了打破该会限于一省职责的体制内定位,直接联络沪、宁等地的外洋知识教育界(也可触及省外的华洋文教界)。该部诸人多在上海、南京两地的学校任职,不少人有留学经历,而留美归国者在交际部中显然最为活跃,由此凸显的外方联络对象,主要是苏省的基督教青年会、新教教会教育系统与美籍世俗文教人士。

交际部的首任书记为余日章。^⑩余氏1913年主持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时称全国组合)演讲部,其长于演说,“善用模型、图表演讲普及教育之重要,输入民众国家观念”,后江苏省教育会设演讲传习所,余氏“为之师”,^⑪基于对青年会与留美学生经验的直接借鉴,江苏省教育会的演说活动得以蓬勃开展。实际上,1914年9月江苏省教育会交际部筹设时最初的成立地点,即在上海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食堂。^⑫1915年黄炎培随农商部游美实业团出国考察,时任农商总长为江苏省教育会会长张謇,而实业团书记即为余氏,故此行颇有江苏省教育会中人“自导自演”的意味,而余氏亦在此“演职员表”之内。^⑬1916年,余氏就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其活动能力还曾引起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的重视,托黄炎培与余联络,请其出版讲稿或编辑外文书籍。^⑭

交际部成立之初,即由余日章撰英文稿一篇,“报告江苏省教育会十年之进步成绩,并宣布交际部之宗旨及办法”,于1914年10月登于“由全国基督教

会中之教育家组织而成”的中国教育会《教育季报》。^⑤后又将内容类似的英文函件分寄省内“各西国教育家士女”，多达四百余封；又寄“他省之教育家名誉卓著者”十余封，“宣布宗旨唯一在联络本省中西教育家之感情，俾能于教育事业上得切磋观摩之益，且能收一致进行之效”。不久收得复函二十余件，“对于交际部所拟办各节，均竭力赞成”。此后，交际部着力加强苏省（尤其是沪、宁两地）的中外交流，一面对外宣传会务，一面听取外方建议，筹划新的教育设施，输入不限于教育学的知识学理，如前引一些民初江苏省教育会附设之研究会，据称便是参考了外方意见而设。^⑥

交际部此期的重要干事还有郭秉文。1914年郭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完成学业，成为中国首位教育学博士。归国后，郭任1914年8月组建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代理校长。^⑦此外，郭的博士论文1915年在美出版，1916年即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推出中译本《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由黄炎培为之作序。在另一面，郭秉文还是基督徒，和余日章一样与苏省的外方势力，尤其是教会教育系统多有接触。他以江苏省教育会名义公开倡议中外学校间的交流合作，但也向西人强调在华宗教教育应受限制，以换取中国政府与中国人的信任。^⑧此外还有稍晚入会的蒋梦麟，详情俟诸另文，兹不赘。

如上所述，五四前夕留美归国、活跃于文教界者除却进入北大的胡适等人，我们应注意到驻留东南者更是为数不鲜，这很大程度上便是黄、沈等江苏省教育会领导人主动寻求这一高学历知识群体的支持，借助其学历、人脉与由学历标示的学理水准，提升自身文教事业的含金量、影响力与权威性。而且，这绝非仅是给予荣誉衔、请其“站台”，而是使其实际承担会务。其中，余、郭在会的情形，是通过安排工作、联络出版著作（如博士论文）等方式，助其成为江苏省其他文教组织的骨干成员，并将之拉入江苏省教育会组织边界之内靠近权力中心的位置；包括江苏省教育会在内的多个组织骨干成员的集会，遂可同时被认为系江苏省教育会的“内部”集会，以一组组织带动或协调多个组织共同行动，该组织争取涉外各方响应或配合的能力也因此有了更多组织架构本

身的保障。与此有所不同，蒋梦麟在该会以外的主要身份在中华职教社，而该社本系江苏省教育会一附设研究会发展而来，其领导层与江苏省教育会存在高度重合。蒋氏驻沪，日常与黄、沈等人的接触更为密切，其“代表”江苏省教育会对外交际也更顺理成章，如1919年4月底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John Dewey）来华讲学，亲至上海码头欢迎的有胡适、蒋梦麟、陶知行等哥大毕业生，其中代表江苏省教育会者即为蒋氏。^⑨

与此相应，民初江苏省教育会领导层引进学理，不再一味来者不拒，而是越发有意结合自身意向与各方信息，辨析、标榜真正的“世界潮流”。晚清时杨保恒、俞子夷、周维城赴日考察，在回国后的宣讲中周维城便称，日本教育“极力步趋欧美”，“而听彼邦教育家之谈论，知西洋学说近数十年屡有变更”，周氏将之总结为改革、社会、折中、实验四说，其中“实验说”为“现今最新之学说”，该学说“因科学之种种实验以研究教育之理法”，实际指向德国实验教育学派。^⑩几乎同一时期，鼓吹学生自由培养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爱里哇德（埃利奥特，Charles W. Eliot）东来，“盛讥日本式教育之未善”，江苏教育界同人闻之“微有所省悟”，也愈发坚定了欧美方面的学理优于日本的信念。^⑪民国初年，黄炎培等试图在知识信息摄取基础上，进一步归结出“世界新潮”的具体标签及相关的学说谱系。^⑫问题是，此种谱系建构多系引用“名人”的只言片语，对相关思想学术史的梳理、对各学理之间具体关联的判定则无法保障准确性。为改善此种表面而零碎的研习状况，亲至欧美的考察所得、拥有海外高学历者的见解以及西洋学者的“现身说法”，便受到了江苏省教育会实际领导人格外的重视。

1912–1918年间，黄炎培继续热衷于海外考察。江苏省教育会中人出外考察堪称频繁，而与黄氏直接相关者，主要是：1913–1914年俞子夷赴美与陈容（主素，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后任南京高师学监主任）、郭秉文汇合考察欧美教育（因欧战爆发，在欧考察告于中辍）；1915年农商部组织游美实业团，黄氏随团赴美，考察实业及教育；1917年黄氏等人赴日本及南洋，重点在美国殖民地菲律宾考察职业教育。

早在晚清,美国已率先表态退还庚子赔款用于教育,江、浙等省教育会积极联络官民各方,筹划本区赴美留学等事宜,^⑧且留美对于学生学力的要求,在时人看来也并不甚高。^⑨留美业务稳步拓展,而至1914年,欧洲战事复使苏教育界的考察对象在“欧”“美”之间进一步向“美”倾斜。赴美考察用度不菲,1913年的赴美之行出于苏省财政拨款,1915年则由农商部赴美实业考察团负担。亦即黄炎培等是利用自身的地位与关系网,为江苏省教育会节省经济支出(江苏省教育会的财务问题见下节),这一方面可反映黄氏等人援引外界资源能力之强,一方面也可说明其不远万里、吸收代表“世界新潮”的特定某类外方学理的心意之坚定。

此期与美方接触较多的江苏教育界考察者与留学生,对于晚清以降大量自日本输入的教育及相关学说,多以浅陋、过时或二手视之,国内若欲“急起直追,勿落后人”,自须直接汲取真正的“世界新潮”,而非倚赖东洋转手。^⑩此种“新潮”标签,包括黄炎培等力倡的实用主义、职业教育,此外尚有生活教育、本能教育、自动(主义)教育、平民(主义)教育等名目,彼此关联,且可将关联延伸至后来进入视野的主义学说,主旨在于强调教育应贴近“社会”或“生活”,在方法上注重培养学生的“个性”及“自治”“自动”能力,突出、抬高教学过程与结果中学生一方的能动性。此外,这些学理内容也牵涉哲学、伦理、心理等其他科类知识学理的引进。唯须言明,基于江苏省教育会领导人向来对于学理研究的理解,汲取外方学理的关键不在求精求深,而在保证“不过时”地将之广播海内。相应地,美籍学者教育家开始在江苏教育界人士惯常言说的学人与学说谱系中凸显,如实验主义哲学与教育学者杜威等人,在国内声名渐起。^⑪

当然,美方的思想文教资源,也未当即占据代表“世界潮流”的优势地位。如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前后,江苏省教育会还加强了对“军国民教育”的提倡。^⑫1917-1918年,美国正式参战,德奥败象渐露,“军国民主义”等标签的意义才连带走向负面,而德式教育与一向被认为主要步武德国的日本教育的光芒也趋于相对黯淡(但并未彻底失去吸引力)。此间,驻于东南的留美学生,正是促成这类国别标签此消

彼长的重要推手。如蒋梦麟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全力鼓吹美式“平民主义”(democracy),以与德式“牧民政治”“军国民主义”相对,德国失败,表明“平民主义已占胜势,世界潮流且日趋于平民主义”。^⑬总之,虽说不至于摒绝其他国家的学理资源,但较之北大、京沪研究系中人对英、法、德、俄等国思想学理仍有相当的摄取力度,江苏省教育会在此方面的“国别”标签可能更单一鲜明,其对于凸显美方资源在五·四前夕全国思想文教革新中的地位,可谓贡献良多。

换个角度看,汲引海外新潮,终归是为应对中国自身的问题。^⑭此期江苏省教育会同人在教育相关学理上积极“崇洋”,却又以致力于解决中国自身问题为由,努力洗刷“媚外”之嫌疑。但在此,海外主要提供“药方”,海内主要仍是展示“病症”,药方虽须因地制宜,海内既有的思想学理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但中土文教整体上务必随着尽可能“新”的外源潮流而改,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1919年初,在与一同出洋的李石曾的谈话中,黄炎培即明言“世界新潮”“风驰电掣以来,真理所在,莫之与抗”,在此潮流的压力或感染之下,“吾国人必有大彻大悟之一日”,而“吾辈”职责,即在“尽其力之所至,唤使早觉,勿久陷于迷途”。^⑮其认为世界“潮流”只可迎不可拒,进而自居国内“先觉”者地位、以觉“后觉”的意识,实不逊于革命党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海内举国求新的氛围中,江苏省教育会中人直接联络外方以汲取最新学理的行动力更上一层楼。黄炎培本人于1919年1月再次至南洋考察,5月初回国;郭秉文等也于3月间出洋经日本至欧美考察。^⑯之前的1918年12月,江苏省教育会已联合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中华职教社在沪上江苏省教育会会所内成立“中华新教育社”,以蒋梦麟为主任。其中北大由校长蔡元培函托黄炎培代表,江苏省教育会另以沈恩孚为代表,其他代表为南京高师代理校长郭秉文、暨南校长赵正平、中华职教社代表余日章,均系江苏省教育会会员。足见这一以“中华”为名的社团之成立会,实为江苏省教育会“承包”,一省级组织在此可以获得多方正式授权,公然“代表”全国。^⑰不久该社更名“新教育共进社”,于1919年2月在沪推出《新教

育》月刊,亦以蒋梦麟为“主干”(即主要编撰人),“在此新时代中,发健全进化之言论,播正当确凿之学说”,其联结各方、借某种海外之“势”以推动海内文教之全盘革新的企愿,昭然可见。^⑤

1919年4月末,杜威受郭秉文、陶知行、胡适、蒋梦麟等人之邀来华,其来华演讲首站,即在上海的江苏省教育会。《新教育》第1卷第3期为杜威专号,具体介绍杜氏哲学、教育学及其他相关领域的学说。至五四运动期间或之后,黄炎培回溯从清末至民初江苏省教育会谋求革新的历程,将之与欧美文教新潮建立直接的联系,给出从划一、严肃教育到发展个性的“自动主义”,以及从书本、虚名教育到注重社会生活的“实用主义”这一双线复合的变化线索。而杜威亲自来华,则使早先“口头笔底”、一鳞半爪的学理研求升格为“探本穷源之指导”,“于是吾人之知识渐归于系统,而措之行事,亦觉有条理可寻而无所惑矣”。^⑥这一段话,正可视为黄氏对清季民初江苏省教育会之学理接受史的梳理,这些学理需要“探本穷源”,自不限于教育专门,而这段历史也显然被建构为一个不断趋于系统与条理化,故也不断趋近其所认定的世界“新潮”本真的过程。

四、官民之间

及时更新教育相关学理、紧追选定的世界文教新潮,几成江苏省教育会的组织性格,并不意味着其关涉政治的初心已遭彻底抛弃。尤其是该会中人向来倾心的“地方自治”理想,在民初仍得延续,且因其组织与人事的稳定性超过曾为袁世凯政府停废的省议会,也超过屡有兴革的省教育行政乃至整个江苏省的军政系统,该组织立足教育界、又标榜不限于教育议题的“民意”,也拥有了较为稳定的人事基础。在清末,江苏教育总会中人可谓“以地方政权掩护绅权,以绅权孕育民权”;^⑦而沈恩孚等也历来认同梁启超等发端的“民史”观,并在进入民国后,继续有意通过以民为本的历史教育,树立或传播“国民”观念。^⑧

不过,江苏省教育会领导层的张謇、黄炎培、沈恩孚在民初均曾任“官”,而在任官期间,他们在教育会中的职衔均未取消。辞官后他们更为频繁地自居为“民”,^⑨但会中往返于官、民或政、学之间者依然有人在,组织本身与官厅的密切联系也从未断绝。

据此而论,江苏省教育会之类的组织诚非“官方”组织,但在实际领导人对官场涉足更浅的民国初年,也依然很难被认为纯系一“民间”组织。^⑩且江苏省教育会在中央教育部及省教育行政系统内,均有较稳固的人脉(如蔡元培、范源廉、袁希涛及曾短暂出任教育总长的张一麐等);该会在民初力倡的实用、职业教育等名目理念,亦曾获得官方的推广背书。协助推广的官方人士,包括总统、督军、巡按使、省长等,也不尽是教育行政系统中人。^⑪

此外,教育会日常运作所需的物质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向政界争取。虽然江苏省教育会中一直有不少经商者,其领导层也有较广的商界人脉,且江苏省教育会可能也已属于各省教育会中开源能力较强,资产较丰,^⑫但据民初江苏省教育会历年岁入岁出表,商界对会中常费的支援实际有限,1915年纱捐停止导致“收入锐减”后更是如此。^⑬且作为“法定组织”,教育会本即不宜“拨用地方公款”,唯可使用行政部门给予之补助金。^⑭事实上,教育会的岁入也主要仰赖省库常规拨款(1918年后实拨5 000—7 000元)及临时补助(一般1 000—3 000元),而省库拨款便须经省议会通过、由省政府执行。民初省款补助已较清末有所增加,但因会中年来“凡同人所认为必要诸端,莫不量力举行”,研究活动广泛开展,用度也水涨船高,对于省款的依赖反有加深之势。^⑮故此,江苏省教育会务必与官厅议会维持较好的关系,以保证资源摄取渠道的畅通。

就与省内外军政当局的关系而言,江苏籍官绅在民初政坛继续活跃,其中,虽然张謇等老辈名流对会务的参与度降低,但江苏省教育会务必顾及这些政、商、学多栖人士之一般政治立场的行事逻辑,也未完全消逝。这些老辈多栖人士的政治倾向,通常是在政派之间居间调解,在政治立场上力求折中,如辛亥革命爆发后筹划南北和议、“二次革命”前后力主和平,相比革命党,其与袁世凯当局的精神距离应当更近。至1915年袁氏筹谋称帝,情况才有明显变化,袁的重要江苏籍幕僚张一麐与张謇等均不赞成帝制,这后来也成为帝制运动失败的一个要因。当时各地的省教育会亦有附和帝制者,如湖北省教育会会长谢石钦曾“以值此军国主义盛行时代,非改用

君宪不能立国,特通电各省学界赞同请愿”,对此,以往在教育会联络中表现活跃的江苏省教育会却反应消极,抬出部章“教育会不得干涉行政及教育以外之事”一条规定,谓赞成帝制系“逾越权限,非所敢闻”,予以回绝。^⑩其实,江苏省教育会因其一直维系的“同人团体”属性,自晚清以来很难说一贯严守部章,此处特地表态“谨守范围”,^⑪显是策略性地援引部章,与江苏籍绅耆保持一致、以免居于“错误”的政治立场。

至于江苏本省,“二次革命”被镇压后江苏即成为直系(冯国璋、李纯)的地盘,而上海在袁死后初由杨善德、后由卢永祥控制,此时杨、卢在直、皖或南北之间,似未有明确的立场偏向(即不能被认为必属“皖系”人物)。江苏省长,在袁死后至五四之前也一直是北洋出身的齐耀琳(震岩,吉林伊通人)。故此期苏教育会与本省多数老辈名流一样,须与上海及南京的北洋军政当局尽力保持合作关系。

不过,民初江苏省政学格局仍有相当变化,尤其是晚清的教育总会、预备立宪公会、咨议局“三位一体”的局面,业已不复存在。这一变化的后果主要体现在江苏省的议教关系中。黄炎培曾任晚清江苏咨议局议员(其中一年为常驻议员)、辛亥年末临时省会议员;但民国肇建,黄氏一度为官,而首届省议会仅留任原咨议局议员约十人,其他百余人皆新加入者。^⑫袁世凯死后议会重设,江苏省精英以“民”之身份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得以恢复,黄炎培也成为第二届省议会(1918年起)议员、第三届省议会(1921年起)候补议员。^⑬但此时张謇已不在议会任职,而黄在议会中的声望一直明显逊于身为进士且曾任省正、副议长的张謇、蒋炳章等,^⑭仅能作为普通议员发表对政务的见解,并重点为教育界争取资源与权益。而1918年第二届议会选举完成后不久,省议会中即动议议员增加公旅费之案,引起议会内的长期争执,及江苏省诸多政商学团体的强烈不满。黄炎培一度参与调停,但终难阻止加费派议员挪移教育经费以自肥的企图。^⑮后有省议员提议将省教育会由沪移宁,以利南京的省议会控制,未有结果;^⑯而省教育界与议会在此问题上的僵持,也一直持续到了五四运动时期,^⑰省教育会中人乃至主张对本省政务加强干

预,由“教育界”监察省议会的下届选举。^⑱

可以说,江苏省教育会是在与议会的争执中勉力维持两者的关系,而其后袁世凯时代对政务的关注,也渐变得更富于批判意识与革新意图。此种批判意识的加强,除却黄炎培等人自身思想变化,^⑲应与会中有留学背景的年轻骨干有关——如交际部余日章、蒋梦麟等,与孙中山派国民党人(中华革命党人)向有交谊,五四前夕又因共同驻沪而屡有往来,据说孙中山撰《实业计划》,校阅原稿的工作即曾由余、蒋负责。^⑳亦即江苏省教育会新近重点吸收之年轻会员的言行方针,也绝非“在教言教”,其对于政治的兴趣,实际不输老辈。

清末沈恩孚曾论及教育、政治与实业三者的关联,谓:“无政治,则教育与实业犹网无纲而裘无领也;无实业,则政治与教育犹鱼无水而牛羊无刍也;无教育,则政治与实业犹夜行无灯、涉大海渡沙漠而无指针也。三者循环,废其一而无以为国。”^㉑在民初江苏省教育会的实践中,政治之于教育等事业的“纲领”地位仍未取消。质言之,此期江苏省教育会与政治的关系变化,主要体现在教育“界”成为黄炎培、沈恩孚等人事业的基本盘,这一点与张謇、唐文治等晚清会中领袖通常难以定出一个主要的“立足”界别,显然存在差异。但“立足”之业界界别的清晰化,并不意味着“关注”界别的专一化,这可使该组织的架构或人事不至屡因中央或东南政局之变而变,但会中人士乃至组织本身仍可延续其标榜“民意”却又与“官”牵连不断的立场,公然地关切政治。^㉒

至五四前夕,国内知识精英倡言的世界“潮流”,时常是复合性的,所谓欧战后的新“趋势”既是思想文教层面的,显然也是外交政治层面的,而江苏省教育会所指的世界“潮流”“趋势”也不时有此“复合”的意味。如强调学生为“国民/公民/平民”之分子,而“自动(主义)”教育之类的标签,也一直以来被江苏省教育会中人与该会的“地方/公民自治”诉求相联系。蒋梦麟等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力倡的“平民主义”,也有鼓动教育界人士关注、评判当前政治,以为学生表率,进而促成所谓“平民政治”的明确意向。^㉓另外,张謇曾参加推动国内南北和议的和平期成会、推动巴黎和会外交的国民外交协会等组织;

多少与之相应,江苏省教育会也密切关注战后政治动向,并曾基于“民”之立场发表意见。^⑩概言之,五四前夕江苏省教育会兼及知识学理研究与民本政治追求的努力,既体现于其区域性的活动,也体现于其意图扩至全国的革新事业。在此立足于区域教育界、但关怀又限于本区本界的组织逻辑的延续发展之中,江苏省教育会介入五四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此方面在今人基础上的进一步探讨,当俟另文展开。

结语

今人考察近代中国文教转型,不宜默认在晚清与五四之间存在一个充满必然性故而无须深论的从“新”到更“新”的递进过程。其间的文教组织研究,也不宜径将组织的兴起演变当作某种整体性思想文教趋势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事实上,组织自身的能动性,亦须予以充分关注,组织行为既处于趋势之中,也可作用于趋势本身。江苏省教育会并无北大那般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法定地位,民初其实际领导权又进一步为一批文化资本不高不低的“中等人”所掌握,却得以维持甚至扩展其在东南区域内外的影响力,并将此影响力进一步用于凸显全国文教革新的某些倾向性。个中缘由,也非仅仅是个别人士“关系网”的变动,而是关乎富于能动性的组织建设,这涉及组织的体制内定位与同人期许的分歧及二者间的协调,以及相应的权力更迭与组织目标的调整,这些变化调整并可折射出时人对于近代“教育”组织应做什么、能做什么的理解之递变。

此外,近代文教转型,往往包含知识人自身身份认同的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讲,民初江苏省教育会的案例可反映出费孝通早先所谓的“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⑪在精英层次的进一步糅合:一些知识人个体于此开始拥有较明确、甚或主要的业界组织身份,但由一己向外推出、且不受业界界别限制的“差序”格局依然重要,此种个人跨界关系网的存在与运作,便使组织中人的身份意识以及组织边界意识又维持了一定的模糊性。不过,对此“转型”,研究者仍须顾及局中人依托组织发挥的能动作用,不宜纯用思想或人的“自然”世代更替作解,^⑫也不能脱离组织之变、将此能动性的基础理解为组织中各人思想状况

的简单累加。^⑬再进言之,此后江苏省教育会亦曾参与将五四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整合为一个涵括思想文教与政治等层面的运动,这也能从此种虽更“接近”、但难言“已经”实现了“在教言教”的个人及组织行为逻辑之中寻找到部分的原因。

最后,应予说明的是,本文主论民初江苏省教育会的个案,并非径以该个案为同期全国各地教育会组织的“代表”。换个角度讲,江苏省教育会在一般省级教育会的共性之外诚然存在许多特性(如开初的“同人团体”属性、位处上海的区位优势等),但此种特性并非构成对于研究意义的消解,相反,本文正要指出这些特性有助于该组织在某些全国性的格局中发挥重要的特殊作用(但也不刻意抹煞其作为教育会组织的共性)。广而言之,某些地域组织个案研究,与其说旨在分辨其共性与特性,不如说是在检视该个案究竟如何介入或促成了更大时空范围内的历史。晚清与五四之间的江苏省教育会,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区域、但又不为区域性所限,将自身编织进一系列多维度的人员与知识观念流通网络,进而维持并发展了其参与“带动”举国之文教革新的意愿与能力。

注释:

①晚清先后称江苏学会、江苏学务总会、江苏教育总会,本文通称“江苏省教育会”,但在晚清阶段通用“江苏教育总会”之名。

②较重要的研究,参见 Ernst Peter Schwintzer, “Education to Save the Nation: Huang Yanpei and the Educational Reform Movement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92; 高田幸男「江蘇教育總会の誕生——教育界に見る清末中国の地方政治と地域エリート」、『駿台史学』103号、1998年3月; 肖小红:《教育与政治: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省际精英——江苏省教育会的案例研究》,《国际汉学》2009年第2期; 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苏省教育会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陈昀秀:《清末的江苏教育总会(1905-1911)》,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 陈以爱:《五四运动初期江苏省教育会的南北策略》,台北《“国史馆”馆刊》第43期,2015年3月; 牛力:《江苏省教育会与东南大学权力格局的兴替(1914-1927)》,《史林》2019年第2期等。

③后来的《江苏省鉴》谓：“苏省于二次革命失败后，政权落北洋军阀之手，然教育事业，较之任何一省特为发达。其中枢纽，全在江苏省教育会。”这段话可能出自曾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的黄炎培之手，但也点出了该会在民初的重要性。见赵如珩编《江苏省鉴》，新中国建设学会1935年版，第7章“教育”第181页。

④学者已指出在研究中辛亥与五四之间的约十年甚易被两端“掩盖”，见罗志田：《救国抑救民？——“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⑤桑兵：《“新文化运动”的缘起》，《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⑥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

⑦丛小平：《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1897-1937）》，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页。

⑧陈以爱称五四当时一个以张謇为领袖、涵括江苏省教育会的“东南集团”发挥了重要作用，见陈以爱：《五四时期东南集团“商战”舆论和抵制运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此说诚有启发，但笔者以为，即便可说在五四当时存在“一个”（而非多个）东南集团，该集团是否公认张謇为领袖，亦可商榷。张的名望得到尊重，不等于其可实际引领上海各界行动，说详另文。

⑨另如蔡元培民初也是浙江省教育会的会员，但显然不能径以蔡的地位、言行佐证浙江省教育会的权势与行事逻辑。

⑩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⑪《江苏教育总会章程（戊申十一月第二次改订）》，《江苏教育总会文牍四编》，上海江苏教育总会1909年版，目次丁第12页。

⑫《沈恩孚叙》，《江苏教育总会文牍四编》第1页。

⑬参见谷秀青：《清末民初江苏省教育会研究》，第14—16页。

⑭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学会》，《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1页。

⑮《沈同芳叙》，《江苏学务总会文牍初编》，上海江苏学务总会1906年版。沈同芳（1872-1917），字友卿，江苏常州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

⑯《江苏省教育会成立以来历年概况表》，《江苏省教育会年鉴（1916）》，第1页。关于法政讲习所的讨论，见高田幸男「清末江苏における地方自治の構築と教育会——江苏教育

總會による地域エリートの[改造]」、『駿台史学』第111号，2001年2月。雷奋（1871-1919），字继兴，江苏娄县人。

⑰《何震彝跋》，《江苏学务总会文牍初编》。

⑱《学部奏定各省教育会章程折》（1906年7月28日），朱有瓚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7页。

⑲省级教育会开初具有“同人团体”属性，似非普遍现象，如清季邻省浙江的教育总会只有“法定团体”属性，领导层人事变动频繁、纷争不断，故在晚清几乎无所作为。到民初经亨颐长会后，才渐发展出“同人团体”的属性。

⑳张朋园：《〈时报〉——维新派宣传机关之一》，《“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1973年5月。江苏教育总会曾被时人怀疑是“政党”，以张謇为“党魁”，见张謇：《辞江苏教育总会会长意见书》（1907年10月26日），李明勋、尤世伟主编《张謇全集》第4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139页。

㉑《江苏教育总会章程（戊申十一月第二次改订）》，《江苏教育总会文牍四编》。

㉒《沈同芳叙》，《江苏教育总会文牍二编》，上海江苏教育总会1907年版；《沈同芳叙》，《江苏教育总会文牍纪事表第三编》，上海江苏教育总会1908年版，栏页第1页。

㉓《驻办员沈同芳留别会所报告三年内之事略》，《江苏教育总会文牍四编》，目次丙第2页。

㉔《驻办员沈同芳留别会所报告三年内之事略》，《江苏教育总会文牍四编》，目次丙第3页。

㉕陈昉秀：《清末的江苏教育总会（1905-1911）》，第119—120页。

㉖《沈恩孚叙》，《江苏教育总会文牍四编》，栏页第2页。

㉗《黄炎培跋》，《江苏教育总会文牍四编》，栏页第1页。

㉘陆尔奎：《论教育会之性质》，《教育杂志》第1卷第9期，1909年9月。

㉙《咨呈江督端筹办单级教授练习所派员请咨赴日本考察文》，《江苏教育总会文牍四编》，目次甲第22—23页。杨保恒（1873-1916），字月如，江苏川沙（今上海浦东）人；俞旨一（1886-1970），字子夷，江苏苏州人，以下均称俞子夷；周维城（1882-1918），字介藩，江苏太仓人。

㉚《黄炎培跋》，《江苏教育总会文牍四编》，栏页第1—2页。

㉛当时另曾组织教育法令研究会，见《江苏省教育会成立以来历年概况表》，《江苏省教育会年鉴（1916）》，第2页。

㉜见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42页。

㉝沈恩孚：《无成人传》，薛冰整理《沈信卿先生文集》，凤

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594页。

③按戴海斌曾提出晚清历史中赵凤昌、陶森甲之类“中等人物”的重要性,本文对“中等人”的定义与之有相通之处,但更多强调其为中等“知识人”,且讨论时段较戴著偏后。见戴海斌:《晚清人物丛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⑤当然各干事对会务的参与度不尽一致,如主要供职于报馆的包公毅(天笑)自1906年起数年被选为会中干事,但他自认是“哑干事”,基本不发言、只参与表决,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32页。

⑥《江苏省教育会十年概况》,上海江苏省教育会1915年版,第12—13页。民初常任调查改由袁希洛(袁希涛弟)担任。

⑦黄炎培:《八十年来》,第49页。

⑧民初各地劝学所实际并未废除,但江苏省教育会会董制仍被取消;而县市乡教育会会长、市乡学务委员则为“当然入会者”。虽然部章规定省县教育会并非上下属关系,但江苏省教育会与苏属地方教育会的联系仍得保持。见《教育部呈拟订劝学所及学务委员会规程文》(1915),朱有瓚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第147页;《江苏省教育会章程》,上海江苏省教育会1913年版。

⑨《江苏省教育会大会纪事》,《申报》1914年8月27日,第10版。

⑩张謇:《致江苏省教育会函》(1916年7月),《张謇全集》第2册,第611页。

⑪张謇:《复社事务所函》《致聂云台函》(均为1921年12月下旬),《张謇全集》第3册,第969页。

⑫庄俞:《元年教育之回顾》,《教育杂志》第4卷第10期,1913年10月。

⑬当然,经亨颐是留日学生,其“中等人”的意味,更偏向于指其经历简单,由留学生而浙江一师教务长、校长,在浙江省城精英中资望较为一般,而其以“教育界”为自身主要业界标签,亦无甚疑问。

⑭如五四运动前后,张謇之名号在电文中屡与江苏省教育会并列,而非被默认为已为江苏教育会所包含。而在1914年8月后的各大报刊中黄炎培的职务也时常被误写为江苏省教育会“(正)会长”。

⑮后来浙江省教育会曾拟援江苏成例,以蔡元培为正会长,另选一副会长“实际办事”,见《浙教育界近事之沪闻》,《申报》1922年6月8日,第15版。

⑯参见高田幸男「近代中国地域社会と教育団体——江蘇教育会の會員構成分析」,『明治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紀要』73冊、2013年3月、123—138頁。

⑰当然两个圈子本有交集,如晚清时杨保恒即曾在龙门师范任职。

⑱《教育部:公布教育会规程》(1912年9月6日),朱有瓚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第252页。

⑲《会员沈君恩孚、黄君炎培拟组织教育研究会意见书》,《教育研究》第5期,1913年9月。

⑳黄炎培:《考察本国教育笔记》,《教育杂志》第6卷第1期,1914年1月;《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1集,商务印书馆1914年12月初版;《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2集,商务印书馆1915年7月初版、1916年5月再版。对于黄氏考察教育日记(另有第3集,即《新大陆之教育》,商务印书馆1917年4月版)的研究,见田正平:《“寻病源”与“读方书”——〈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阅读札记》,《教育研究》2013年第12期。

㉑《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1集,第1—2页。

㉒《江苏省教育会二十年概况》,第28—29页。

㉓《江苏省教育会十年概况》,第15—16页。

㉔赵如珩编《江苏省鉴》第7章“教育”,第196页。

㉕参见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85、619页。

㉖张謇:《发刊辞》(1913年4月30日),《教育研究》第1期,1913年5月。

㉗王朝阳:《记者宣言》,《教育研究》第1期,1913年5月。王朝阳(1882—1932),字旭伦、饮鹤、野鹤,江苏常熟人,时为江苏省教育会评议员,后曾任干事。

㉘《江苏省教育会二十年概况》,第30页。

㉙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教育杂志》第5卷第7期,1913年7月;《会员黄君炎培请分送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书》,《教育研究》第7期,1913年11月;王朝阳:《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研究》,《教育研究》第8期,1913年12月。

㉚庄俞:《采用实用主义》,《教育杂志》第5卷第7期,1913年7月。

㉛黄炎培:《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三年》,《教育杂志》第9卷第1期,1917年1月。

㉜《江苏省教育会大事记》,《江苏省教育会年鉴(1916)》,第10页。

㉝《江苏省教育会职业教育之研究》,《教育与职业》第1期,1917年10月。

㉞参见沈泽民:《学校调查: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少年世界》第1卷第4期,1920年;陈训慈:《南高小史》,《国风》(南京)

第7卷第2期,1935年;《母校校史》(1926年)、《校史》(1929年),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编《暨南校史资料选辑》第1辑,1983年,第3、9页。

⑤如1909年蒋维乔曾与沈恩孚联络,请教育总会接手爱国女校,沈称此举“于事实上不可”,须先组织校董会,再由总会间接维持。见《蒋维乔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28—329页。实际上,之所以要成立中华职教社,方才开办中华职业学校,部分原因也应是江苏省教育会直接办校于制不合。

⑥《江苏省教育会章程》,上海江苏省教育会1912年版。

⑦《江苏省教育会章程》,上海江苏省教育会1916年版。

⑧这是借用孔飞力(Philip Kuhn)的提法,见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谢亮生、杨品泉、谢恩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⑨在江苏省教育会年鉴所载的职员累任次数表中,交际部干事称“交际干事”,其他部干事仅通称“干事员”。

⑩《江苏省教育会大事记》,《江苏省教育会年鉴(1916)》,第3页。据该年年鉴中《江苏省教育会历年职员任期久暂表》,1915—1916年度曾由吴馨担任“交际部主任”一职。余日章(1882—1936),湖北蒲圻(今赤壁)人,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

⑪黄炎培:《余日章君纪念碑》,《人文》第7卷第9期,1936年11月。

⑫《交际部报告书(第一次)》,《教育研究》第19期,1915年1月。

⑬《游美实业团书记余日章致农商次长书》,《教育公报》第2卷第5期,1915年9月。按基督教青年会对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影响已开始受到重视,见张仲民:《胡适何以“暴得大名”?——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的再思考》,《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⑭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上册,第150页。按余日章之前的青年会总干事王正廷(1882—1961,浙江奉化人,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在总干事任上的1915—1916年,也是江苏省教育会交际部干事。

⑮David Z. T. Yui, "Ten Years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Kiangsu Province," Educational Review, Oct. 1914, pp. 10—12,收入中国教育会编《教育季报(1907—1938)》第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134页。

⑯《交际部报告书(第一次)》,《教育研究》第19期,1915年1月。

⑰《江谦为休养病体暂请郭秉文代理校务呈教育部文》(1918年3月),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

编》第2卷《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时期》上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

⑱"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is Advocated," The China Press, Feb. 11, 1915, p. 1.

⑲"Article 6,"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May 3, 1919, p. 265.

⑳《考察单级教授杨保恒、俞旨一、周维城回国后谈话会纪要》,《江苏教育总会文牍四编》,目次丙第110—126页。该学派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参见时益之、侯怀银:《德国实验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1期。

㉑《黄炎培日记》第2卷,第63—64页。

㉒庄俞:《采用实用主义》,《教育杂志》第5卷第7期,1913年7月。

㉓《致浙江教育总会商办派生赴美留学书》《再致浙江旅沪学会书》《浙江旅沪学会转到呈文复书》,《江苏教育总会文牍四编》,目次甲第64—66页。

㉔《沈恩孚叙》,《江苏教育总会文牍五编》,上海江苏省教育会1910年版,栏页第1—2页,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㉕俞子夷:《欧美教育考察中之报告》,《教育研究》第13期,1914年7月。

㉖参见俞子夷:《现今学校教育上急应研究之根本问题》,《教育杂志》第6卷第12期,1914年12月。

㉗吴家煦:《军国民教育救国篇》,《中华教育界》第4卷第2期,1915年2月;《江苏省教育会议事月表(起民国三年七月迄四年十二月)》,《江苏省教育会年鉴(1916)》,第43页。

㉘蒋梦麟:《和平与教育》,《教育杂志》第11卷第1期,1919年1月。

㉙黄炎培:《东西两大陆教育不同之根本谈》,《教育杂志》第8卷第1期,1916年1月。

㉚黄炎培:《与李石曾君谈职业教育》,《教育与职业》第12期,1919年3月。

㉛《欢送赴欧调查教育之代表》,《申报》1919年3月7日,第10版。

㉜《中华新教育社成立》,《申报》1918年12月24日,第10版;《江苏省教育会会员姓名录》,上海江苏省教育会,1918年。

㉝《本月刊倡设之用意》,《新教育》第1卷第1期,1919年2月。

㉞《黄炎培日记》第2卷,第64页。

㉟黄炎培:《沈信卿先生传》,《人文》复刊第2期,1947年7月。

㊱沈恩孚:《复沈朵山》,薛冰整理《沈信卿先生文集》,第

364—365页;沈恩孚:《对于中等教育中国历史教材之意见》,《新教育》第5卷第1—2合期,1922年8月。

⑦如辞官后的黄炎培曾明以“无一字须报告官厅”为其国内考察的优点;之后他屡次拒绝任官,包括在1919年初拒绝出任江苏督军署顾问,见黄炎培:《考察本国教育笔记》,《教育杂志》第6卷第1期,1914年1月;《南京快信》,《申报》1918年12月31日、1919年1月15日,均为第7版。

⑧有学者将教育行政机关与教育会在人事上的互换称为“旋转门”,见丛小平:《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1897-1937)》,第114页。

⑨参见黄炎培:《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一年》,《教育杂志》第7卷第1期,1915年1月;黄炎培:《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二年》,《教育杂志》第8卷第1期,1916年1月。

⑩参见赵如珩编《江苏省鉴》,第7章“教育”第200—203页。

⑪《江苏省教育会收支总报告》,上海江苏省教育会,1915年。

⑫《教育部:公布教育会规程》(1912年9月6日),朱有瓛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第253页。

⑬《江苏省教育会收支总报告》,上海江苏省教育会,1919年;赵如珩编《江苏省鉴》,第7章“教育”第210—213页。

⑭《江苏教育会不干行政》,力轻:《湖北教育会与江苏教育会之比较观》,《崇德公报》第21期,1915年10月17日。后黄炎培在纪念沈恩孚的文章中曾谓“某省教育会既屈于势,电邀江苏列名,江苏覆电拒绝而公布之,实为全国抗袁第一声”,应即指此事,见黄炎培:《沈信卿先生传》,《人文》复刊第2期,1947年7月。一说此番表态系贾丰臻的提议,见孙筹成:《悼贾季英先生》,《新闻报》1945年12月1日,第2版。

⑮《江苏省教育会谨守范围》,《新闻报》1915年10月2日,第3张第1版。

⑯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197页。

⑰《江苏省议会第二届议员姓名年岁籍贯一览表》,《江苏省议会第二届第一次常年会议决案类编》第3册,1918年,上海图书馆藏;《江苏省志·议会人民代表大会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3、26、35—45页。

⑱如第二届江苏省议会正议长为钱崇固(1881—1928,强斋,江苏苏州人),副议长为鲍贵藻(勤士,一作芹士,1867—1953,江苏仪征人)、孙微(傲人,一作谨臣,1866—1952,江苏南

通人),而选举副议长时黄炎培仅得寥寥数票,见《苏省会副议长产出》,《申报》1918年10月16日,第7版。

⑲《苏议会纪事》,《申报》1918年12月8日,第7版。

⑳《南京快信》,《申报》1919年4月5日,第7版;《江苏省教育会议事月表(民国八年一月至十二月)》,《江苏省教育会年鉴(1920)》,第22页。

㉑《省教育会反对省议员加费》,《申报》1919年5月20日,第11版。

㉒梦麟:《教育界与江浙两省议会》,《时报附张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1919年5月26日;《呜呼江浙两省议会》,《新教育》第1卷第4期,1919年5月(实6月)。

㉓黄炎培在晚清也曾加入同盟会,只是之后与张謇等立宪派士绅关系更密。

㉔蒋梦麟:《西潮与新潮》,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8—91、122页。

㉕《沈恩孚叙》,《江苏教育总会文牍六编》,上海江苏教育总会1911年版,栏页第1—2页。

㉖许纪霖曾总结黄炎培长年经营教育事业,对于政治亦向有关心,唯“可以下河,但不愿涉水过深”。见许纪霖:《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勱与现代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90页。

㉗《教育与政治》,《新教育》第1卷第1期,1919年2月。江苏省教育会所倡的“平民主义”并不主指下层民众,详另文。

㉘《江苏省教育会致北京电》,《申报》1919年2月8日,第6版;《省教育会请审慎铁路借约》,《申报》1919年2月14日,第10版。

㉙费孝通:《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2—29页。

㉚高田幸男曾对1905—1913年左右苏教育会会员的年龄、职业情况有详细的统计分析,见高田幸男「近代中国地域社会と教育团体——江苏教育会の會員構成分析」,『明治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紀要』73冊、2013年3月。但要强调的是,“年轻人必然比年长者更‘新’”的判断实难成立,如本文所示,江苏省教育会民初的革新事业很大程度上是老中青多代协力促成的。

㉛江苏省教育会会员甚众,各成员在具体的思想新旧问题上歧异甚多,简单累加的结果无法印证组织本身显现的目标倾向。